

大象出版社

大象学术书坊

唐宋文史论丛

及其他

◎傅璇琮



大象学术书坊

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

傅璇琮 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傅璇琮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4. 10

ISBN 7 - 5347 - 3392 - 8

I . 唐... II . 傅... III .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唐代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宋代
IV . 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1980 号

责任编辑 郭一凡

责任校对 钟 骄

封面设计 张帆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制 版 河南大象出版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22

字 数 600 千字

印 数 1—2 000 册

定 价 40.00 元

若发现印 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商城路 231 号

邮政编码 450000

电话 (0371)6202901

前言

前言

收于本书,时间最早的是 1958 年夏为中华书局《邢襄题稿、枢垣初刻》而写的出版说明,那时我刚从北京大学中文系转至出版社,年二十五岁,而本书所收时间最近的是 2003 年上半年为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编纂、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全宋笔记》所作的序,其间竟有四十五六年。在这四十余年中,我除了自作或与友人合作,编撰有几部专著外,另出版有三本论文集,即《唐诗论学丛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初版,京华出版社 1999 年增订重版),《濡沫集》(湖南人民出版社“书海浮槎文丛”本,1997 年),《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年)。现在我新编这本论文集,为自己立有两项宗旨,一是与前面三本所收不重复,二是所收之作,不论长文或短篇,希望从总体上能反映我这几十年间的治学途径与坎坷历程。

我不拟在这里对本书详加论述,只是想对编排略作介绍。由于所收的篇目多,为便于读者披览,就大致分为六编,即分甲、乙、丙、丁、戊、己。甲编所收是近几年来所撰的有关唐代翰林学士研究论文,重点是就唐代高层士人作为研究的中介环节,探讨当时文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这似乎已引起文史学界的关注。乙编所收,重点是有关唐宋时期作家作品的考索,也涉及某些学术著作的评论。丙编则是为学界友人所作的书序。丁编所收为缅怀已去世的三位学术前辈:匡亚明先生在任

南京大学校长期间开始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我于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际曾几次去南京参与过有关的学术会议，后他于90年代初受任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嘱我为古籍小组秘书长，我就与匡老接触较多，深受教益。我与钱钟书先生与邓广铭先生，学术交往更多，所受教益更深，我在文中诚致怀念之情。戊编是我在中华书局工作期间起草撰写的几篇出版说明，并略叙我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一些情况与体会。己编，似不能算是学术文章，我想借此向读者介绍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在古典文学界，唐代文学学会所起的作用是较为突出的，这已为学界所共识。唐代文学学会建立于1982年，在此之后，就每年编有《唐代文学研究年鉴》，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会议后则编印《唐代文学研究》论文集，这一有序的学术活动，已坚持了二十多年，实很难得。首届会议时，我当选为常务理事（当时会长为山东大学萧涤非教授），具体工作是与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几位学者合作，编辑《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因此曾写有《年鉴工作要有一个总体规划》一文。后我于1992年被选为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年鉴》与《唐代文学研究》的编辑重任就由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张明非教授和西北大学中文系阎琦教授承担，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延续至今。这次我选录几篇年会开幕词，以供读者了解唐代文学学会健康发展的历程，和唐代文学界求实、创新、团结、奉献的学术风气。

每一编所收之文，除己编外，不按时间先后排列，而按内容，作适当的编排，但文后都注明刊发日期。

这里我想再补述两点：一是“文革”前所作，我这次选了七篇。1958年初，我因所谓参与筹办“同仁刊物”，与现仍为北大中文系教授的乐黛云、褚斌杰等被划为右派。我于1958年3月被迫离开北大，至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后因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出版任务分工调整，我又转至中华书局，先在古代史编辑室。当时中华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同志曾对我说：“你来中华，先要好好工作，在工作中改造。”我没有想到，我一到古代史编辑室，金灿然同志就叫我写《邢襄题稿、枢垣初刻》一书的出版说明。这是明代末年一位官员的奏议，颇有史料价值，

但从未刊刻，仅有抄本，中华书局从河南一位收藏者获得，加以校点，并加排印。当时给我的就是已排出的清样。对于一个刚跨进中华书局大门、只不过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就交给这一任务，真不可想象。当时我确很畏惧，但还是谨慎小心，勉力为之，到图书馆去查阅一些资料，终于写出这二三千字之文。后我在文学编辑室，又遵编辑室主任徐调孚先生及影印部老辈学者陈乃乾先生之嘱，为点校本《全唐诗》、影印本《史通》、影印本《四库全书总目》、影印本《清人考订笔记》撰写出版说明。现在我每次重读这几篇文章，一种受信重的感激之情总要涌上心头。当时我在政治上是受压抑的，但在中华书局的特殊环境中，我却有一心做学问的志向，未有什么屈辱感。正因如此，我在工作之余，就利用夜间和节假日，读书作文，于 1959 年至 1963 年间，撰成《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共收辑北宋至晚清四百六十余种书的有关资料，约七十万余字。在《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基础上，另撰有《范成大佚文的辑集与系年》，刊于《文学遗产增刊》（1962 年）。这次阅校样，重读此文和 1962 年 9 月所写的《读〈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我真惊讶，文中所提及的一些书，我竟很陌生，好像没有读过；我真觉得，现在要我来写，是绝对写不出来的。我由此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我们做学问，确不必有什么政治牵挂之虞和世态炎凉之辱，真如我为《李德裕年谱》新版题记所立的标题：“一心为学，静观自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11 月）。

另一点是，我于上一世纪 80 年代，即受学界友人之约，为其所著撰序。最早的一次，是北大中文系师友陈贻焮教授要我为他的《杜甫评传》作序，此序作于 1981 年 10 月，其书上卷于 1982 年 8 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第二篇是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邓绍基先生《杜诗别解》所作，写于 1984 年 12 月，书则于 1987 年 10 月在中华书局出版。此后受托，年龄比我稍大的，是曹道衡先生（《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和罗宗强先生（《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其他多是中青年学者。说实在话，我受约作序时，真有一种压力，怕写不好。也正因此，我每次

作序，都要通阅全书，有时还不止看一遍。可能因长期做编辑工作，习惯于札录一些问题，请作者复核、修订。在序中我除了介绍书的内容外，总还是就学术上的一些问题谈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也可以说是与友人在学术上进行切磋交流。我于 1990 年为《唐诗论学丛稿》所作的后记中曾说：“近十年来，我有两个收获，一是写了几本书，二是结识了不少学术上的朋友；在某种意义上说，第二个收获比第一个更宝贵，更值得忆念。”1998 年原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成员张世林同志，邀约当代学者撰写自己的学术历程，编《学林春秋》一书，我应约写《我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即收于本书戊编）。在文前我又按此书体例，写了两句自作的格言：“我最大的心愿是为学术界办一些实事，我最大的快慰是得到学界友人的信知。”我想，这或许也可作为本书的概括，其他我就不说了。

不过最后我还想特为一提，就是本书之能面世，完全是因为得到大象出版社的支持。我最初向大象出版社名誉社长周常林和社长李亚娜两位先生提出时，马上得到赞同出版。这使我想起，1999 年夏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因已启动编纂《全宋笔记》，就曾与我商议出版事，我当时说，大象出版社在郑州，河南是北宋的基地，最好首先请大象出版社考虑。《全宋笔记》规模不小，分量大，出版社经济负担是很重的。但大象出版社完全从长远的文化建设着眼，毅然承担。上海师大古籍所后陆续交稿，大象出版社还特地聘请原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审陈新先生为之审稿，往返修改，质量有明显提高。我这次的稿件，也由大象出版社约请袁健先生审阅，帮我改正不少文字上的错失。对此我铭感于心。

傅璇琮记于 2003 年 12 月，
北京六里桥寓舍，时当多年未有的暖冬。

目 录

目
录

甲 编

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	(1)
李白任翰林学士辨	(16)
唐德宗朝翰林学士考论	(28)
唐永贞年间翰林学士考论	(42)
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	(59)
唐宪穆两朝翰林学士考论	(72)
唐玄宗朝翰林学士传	(96)
唐肃宗朝翰林学士传	(130)
唐代宗朝翰林学士传	(151)
《翰学三书》编纂小记	(175)

乙 编

王粲作《英雄记》志疑	(180)
读《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	(184)
《滕王阁诗序》一句解 ——王勃事迹辨	(192)

武则天与初唐文学	(200)
横空出世 清逸自如	
——历史文化与地域文化中的李白	(219)
温故知新 倍感亲切	
——重读《元白诗笺证稿》	(223)
《白居易集笺校》评介	(229)
白居易评价中的一个问题	(235)
卢纶家世事迹石刻新证	(240)
从多方面了解韩愈	(245)
柳宗元学术史上的力作	
——评高文、屈光的《柳宗元选集》	(249)
唐代诗人李敬方事迹辨正	(256)
新世纪中国诗歌研究三题	(258)
唐代长安与东亚文化	(266)
谈《全唐文》的修订	(272)
关于《全唐诗》的改编	(281)
喜读《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	(292)
评《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	(300)
关于编纂《全宋诗》、《全宋文》的建议	(303)
《宋登科记考》札记	(307)
范成大佚文的辑集与系年	(320)
陆游南郑从军诗失传探秘	(336)
《万历十五年》出版记事	(346)
奇文共赏 疑义相析	
——《柳如是别传》怎样读	(355)
关于《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制订	
工作情况说明	(361)
力求务实创新 切忌急功近利	(366)
文学古籍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	(369)

古籍标点中两个应注意的问题	(376)
清华学风应作进一步具体探索	(379)
建议加强专题个案性的研究	(385)
细活与精品	
——从两本冷僻书谈起	(391)
《文史》掇忆	(394)
于平实中创新	
——记台湾学者罗联添先生的治学成就	(401)
“近五十年来台湾地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概况”正在编撰 中	(411)

丙 编

陈良运《周易与中国文学》序	(414)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序	(422)
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序	(429)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序	(434)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序	(439)
陈友冰《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序	(446)
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序	(451)
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序	(456)
陈飞《唐代试策考述》序	(460)
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序	(465)
陈耀东《唐代诗文丛考》序	(469)
胡可先《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序	(477)
竺岳兵《浙东唐诗之路》序	(481)
张忠纲《全唐诗大辞典》序	(483)
《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序	(487)
傅明善《宋代唐诗学》序	(495)

张高评《宋诗特色研究》序	(499)
陶文鹏等《宋词三百首新译》序	(503)
《黄庭坚研究论文集》序	(507)
杨庆存《黄庭坚与宋代文化》序	(512)
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序	(516)
方勇《南宋末年遗民诗人群体研究》序	(522)
《全宋笔记》序	(526)
《名家彩绘四大小说名著》序	(534)
翟胜健《曹雪芹文艺思想新探》序	(538)
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序	(542)
黄世中《中国古典诗词：考证与解读》序	(548)
《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序	(552)
《百年学科沉思录》序	(554)
《中国文学大辞典》序	(558)
《中华名人轶事》序	(563)
《天台山历代诗选》序	(570)
《宁波风光画集》序	(573)
《中国古典文学少年启蒙丛书》序	(575)
《中华古诗文名篇诵读》序	(578)
《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序	(582)
四库本《毛奇龄合集》序	(589)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序	(594)

丁 编

纪念匡亚明先生，做好古籍整理工作	(599)
独立不阿的人品 沉潜考索的学风	
——纪念邓广铭先生	(605)
记钱钟书先生的几封书信	(611)

缅怀钱钟书先生 (615)

戊 编

- 《邢襄题稿、枢垣初刻》出版说明 (621)
点校本《全唐诗》出版说明 (625)
影印本《史通》出版说明 (628)
影印本《四库全书总目》出版说明 (632)
影印本《清人考订笔记》出版说明 (635)
我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639)
《学林漫录》第一集题记 (653)
《学林漫录》第三集题记 (656)
“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
——杂忆《学林漫录》 (659)
《唐代科举与文学》重印题记 (662)
《唐代诗人丛考》重印题记 (668)

己 编

- 年鉴的工作要有一个总体规划 (672)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十年工作报告”
(1992年,福建厦门) (676)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开幕词
(1994年,浙江新昌) (683)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开幕词
(1996年,陕西西安) (685)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开幕词
(1998年,贵州贵阳) (688)

唐玄肃两朝翰林 学士考论

1984年冬，我撰成《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在自序中曾说及，我想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有唐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并由此研究唐代社会特有的文化风貌，于是就先选择科举制度，想从科举入手，掌握科举与文学的关系，以便从较为广阔的社会背景来认识这一时期的文学。序言中还写道：“如果可能，还可以从事这样两个专题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样在地方节镇内做幕僚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这两项专题的内容，其重点也是知识分子的生活。”^①在这之后，一直在扬州师院和扬州大学任教的戴伟华先生，即专注于唐代方镇幕府与文学的研究，撰写有《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等书，在这方面极有开拓之功。我曾遵嘱于1993年为《唐方镇文职僚佐考》作序，序言中再次提及唐代的翰林学士与方镇幕僚，对前者，我较《唐代科举与文学》自序多说了几句，谓：“翰林学士，那是接近于朝政核心的一部分，他们宠荣有加，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险境丛生，不时有降职、贬谪，甚至丧生的遭遇。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但看看这一类知识分子，几经奋斗，历尽艰辛，得以升高位，享殊荣，而一旦败亡，则丧身破家。这是虽以文采名世而实为政治型的知识分子。”^②

我始终认为，研究唐代的翰林学士，其重点仍然在于那一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从这一点着眼，可能收获会较多。但这些年来，有些论著从史学角度，又以宏观手法，对唐代翰林学士的政治作用，作过高的估价，认为翰林学士设置以后，特别是中唐以后，“内廷外朝便有了两个并行的决策机构”^③，“其设置目的在于排斥中书门下决策体制，削弱宰相职权”，并认为“外朝中书门下则由于丧失决策权而逐渐蜕化为行政机关”^④。有些论著不加分析地沿袭唐代文献中所谓“内相”的比喻说法，把翰林学士的权力凌驾于宰相之上。实际上这些都不是从材料本身出发，与事实不合。唐代的知识分子，固然有通过翰林学士的途径，表示自己的政见，施展自己的谋略，但在朝中并没有形成独立的中枢机构作用。他们往往屈从于掌握实权的宰相和宦官，如果与这两者有所冲突，则大多以失败而告终。这是古代文人参与政治的根本弱点和带有一定普遍性的惨痛教训。如大家知道，白居易于宪宗元和十年（815年）贬为江州司马，史书上记载是因为宰臣武元衡为盗所杀，白居易第一个上书，于是为人奏为越位，而实际上白居易自己则以为，此事乃起祸于前几年即元和二年至六年任翰林学士时，那时“不识时之至讳”，“直奏密启”，这样一来，“握兵于外者，以仆洁慎不受赂而憎；秉权于内者，以仆介独不附己而忌；其余附丽之者，恶仆独异，又信狺狺吠声，惟恐中伤之不获。以此得罪，可不悲乎！”这是白居易贬至江州后的第二年写给亲友杨虞卿的^⑤。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而却为人所忽视。白居易是一个很有见解、很有个性的人，他的《新乐府》、《秦中吟》即作于翰林学士时。而正因如此，得罪了“握兵于外者”、“秉权于内者”，以及“附丽之者”，终于被贬，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类似者还有，甚至比白居易更惨。我们不应从某种观念、设想出发，作一种看似概括性强而实为虚拟的推想。

遗憾的是，这些年来的有关论文，还往往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如把李白、杜甫，与宋朝的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同样列入翰林学士之列^⑥。事实上李白只是翰林供奉，未曾作过学士，杜甫则根本与翰林学士院无关。又如说翰林院设立于唐初，唐高祖、太宗时的大臣如

魏征、李百药、岑文本、褚遂良，高宗初期的许敬宗、上官仪，都曾在翰林院内待诏^⑦。实则唐代史籍明确记载，翰林院是唐玄宗即位后才设立的，这距唐高祖、太宗时已有八九十年。

有的更对过去的材料不加鉴别，以讹传讹。如《新唐书·百官志》一，记翰林学士，“入院一岁，则进知制诰，未知制诰者不作文书”。宋朝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所载同，费衮《梁谿漫志》亦载，并加上一句“但备顾问、参侍行而已”(卷二)。前些年凡论述唐翰林学士者，均本此说。而实际上，仅根据两《唐书》列传所载，即可证明此说不确。如李德裕于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穆宗即位后，即召为翰林学士，“禁中书诏，大手笔多诏德裕草之”，后长庆元年(821年)才为知制诰，二年二月转中书舍人^⑧。又杜元颖，元和中召入为翰林学士，“手笔敏速，宪宗称之。吴元济平，以书诏之勤，赐绯鱼袋，转司勋员外郎、知制诰”(《旧唐书》卷一六三本传)。类似的情况，又见《旧唐书》卷一六七《段文昌传》，卷一六八《钱徽传》、《高钱传》，卷一七二《萧俛传》，卷一七三《陈夷行传》，都是入为翰林学士，即已草诏，然后再知制诰。由此可见，我们应对过去的材料作细心的考察，对有关的记载作全面的清理，这样才能对翰林学士的职责、作用等，作出准确、客观的评析和判断。

二

据上所述，唐代翰林学士确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而要研究翰林学士，则必须注意两点，一是应把重点放在当时文人参与政治的方式及其心态，从而以较广的社会角度来探讨唐代的文人生活及文学创作；二是应着重于个案研究，避免笼统而又不适当的所谓宏观概括。就第二点而言，我以为，应先从不同的时段，来看一看这翰林学士群体在不同时期所处的政治环境与文化世态，并对有代表性的人物作某种典型性的剖析，然后可以作出总体性的、有学术价值的结论。

这几年来，我已积累了一定的材料，拟仿照《唐代科举与文学》，撰写一部《唐代翰林与文学》。现在这篇《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就

是其中之一，拟以文和史相结合，对唐代翰林学士起始阶段作一番考察。

关于唐玄宗时设翰林学士的过程，《新唐书·百官志》一，有较概括的记述：

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

这一段大致是概括中唐时李肇《翰林志》及《旧唐书·职官志》而成的。李肇《翰林志》记述，唐朝开国初，依据前朝典制，在中央设有中书舍人六员，专掌朝中重要官令（即“诏诰”）的起草，但从太宗起，历高宗、武后、睿宗，其间又选取有文名才气的官员，召入宫中，为帝王撰草文书，但未有正式名号。《翰林志》接着说：“玄宗初，改为翰林待诏，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相继为之，改为翰林供奉。开元二十六年，刘光谦（謹）、张垍乃为学士，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⑨关于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之合与分，《翰林志》也有记载：“至玄宗置丽正殿学士，名儒大臣，皆在其中。后改为集贤殿，亦草书诏，至翰林置学士，集贤书诏乃罢。”^⑩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在记述翰林院时，也谈及“玄宗即位，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垍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但没有如《翰林志》所说，张说等入为翰林待诏，又改为翰林供奉。事实上，在当时，所谓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实为同一职名，即在皇帝左右，待皇帝吩咐，替皇帝办事。这方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天宝十三载正月所记，较为清晰：“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刑部尚书张均及弟太常卿垍皆翰林供奉。”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四有“翰林”一条，即据两《唐书》，记唐代历朝工艺书画之士，及僧人、道士、医

官、占星等，均入“待诏翰林”之列，而这些人又称之为翰林供奉。

唐代的“供奉”一词，甚为复杂，有称僧道为内道场供奉的，也有称某些朝官的，如中书舍人内供奉、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左补阙内供奉等，这可专文探讨，此处不赘。而在有关唐代墓碑的署名中，更可见出翰林待诏与翰林供奉实为一事。如清王昶所辑《金石萃编》卷八八《大唐赠东平郡太守章仇府君神道之碑》，书碑者为玄宗时著名书法家，其所署之衔为“翰林院学士内供奉”；同书卷一〇七《邠国公（梁守谦）功德碑并序》，所署为“朝议郎权知抚州长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翰林待诏陆邵篆额”。类似者还有：宋陈思《宝刻丛编》卷六《唐何进滔德政碑》：“翰林待诏梁王府司马唐玄度篆额”；卷七《唐赠司徒马璘新庙碑》：“太子中允翰林待诏韩秀襄分书题额”。明都穆《金薤琳琅》卷十《唐故右武卫将军赠工部尚书上柱国上蔡县开国侯臧公神道碑铭并序》：“翰林待诏光禄卿李秀岩篆额”。——从这一侧面，确可见出，当时在宫中任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的，不少是有才艺之士，并非像现在有些文章所说的，他们是品位极低的滥竽之徒。翰林学士与翰林供奉、待诏等相聚在一起，应是组成一个有较高层次的文化群体。这也可作为一个唐代的文化专题进行研究。

李肇《翰林志》及新旧《唐书》，都提及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与翰林学士的关系。这对我们研究玄、肃两朝翰林学士的政治环境与文化氛围，是必须注意的，特别是中书舍人，在整个唐代，其作用不可忽视，不能像有些论著所说，自有了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的职权被大大削弱，甚至变成可有可无，或形成与翰林学士相敌对的官僚机构。事实上，在玄、肃两朝，中书舍人，其政治声望与文学声誉，是大大超过这一时期的翰林学士的，这可能也为现在一些研究者所忽略。

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二一《官制·台省》记中书舍人，曾谓：“自永淳以来，天下文章道盛，台阁髦彦，无不以文章达，故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翰廷之盛选。”^⑪永淳为唐高宗年号（682年），自后即武则天实际掌权。此处对中书舍人的赞誉，简直如同中晚唐时对翰林学士的赞词。至唐玄宗开元时，中书舍人以文词见称者更多，前后成为接续不断